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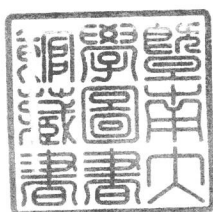
中國哲學研究論集

陳德民 著



# 中國哲學研究論集

陳俊良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中國哲學研究論集／陳俊民著．-- 初版．-- 臺  
北市：臺灣商務，1994[民 83]  
面：公分  
ISBN 957-05-0829-9 (平裝)

1. 哲學-中國-論文，講詞等

120.7

82008532

## 中國哲學研究論集

定價新臺幣二五〇元

著者 陳俊民

責任編輯 詹賜珠 曾韻華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者 劉斐娟 梁景芳

發行人 張連生

印出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刷版所者 臺北市100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三一六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 一九九四年一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自序

這本《中國哲學研究論集》，紀錄了我十五餘年來在中國思想文化這塊田地裏，主要環繞著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盡心探索、追求的足跡。

這是我一九九一年夏季在德國講學研究期間編定成冊的。時節如流，日忽忽其年餘。當我今夏眼看即將結束這次應余英時教授兄之邀，而有幸整整兩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查書問學之際，我似乎覺得有一件心事尚未了結，這就是為本書寫序，寄希望於有心的讀者能從中體察到像我等胸抱現實關懷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是如何為追求真正獨立自主的學術研究而蹣跚前行的。

學術之獨立，思想之自由，本是中外一切學術思想發展繁榮的基本前提。可是，在我們這個長期以「政治掛帥」的國度裏，它只能成為遠自梁啟超、章太炎到王國維、胡適，近至現代無數永葆「良知」、「良心」的優秀學人們，前仆後繼所孜孜以求的最高學術理想。記得王國維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有一段說得很精采，他說：

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爲目的，而不視爲手段而後可。……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於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爲一手段，而非以爲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爲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於其獨立而已。

（《王靜庵文集》第一七三——一七六頁。臺灣僑勉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六月出版）

回想起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從「反右」、「反修」，直到「十年文革」，幾乎所有人文、社會學科，乃至自然科學，都成了「爲政治服務」的手段，連歷史上的孔夫子、儒家學派也無一例外。一切學術的價值，只能以它是否「爲政治服務」及其服務之成效「好壞」來判斷，它自身已無價值可談！現在許多人似乎已忘卻了這段令人喋血飲泣的歷史，當然有些人大概從來就沒有記住它；然而，它卻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裏，成爲本書所收諸多文字當初之所以發端的特殊歷史背景。

本書分「辨學篇」與「接引篇」上下兩編，共輯選出近十五年我所撰寫的主要論文十三篇。其中有得有失，有長有短，但基本觀點始終一貫，蓋爲本人立志從事的中國哲學思想文化學科的健康發展而探古驗今，接引中西，上下求索。因此，除作個別文字修飾外，仍其原貌，不多改動，以真實紀錄我的學術心路及其取向。

放在上編首篇的是《孔子儒家考辨——關於孔子儒家之儒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這是我一九七六年因世人皆知的「深挖洞、廣積糧」而「因公」腰部受傷後，整年臥硬板床釀出的苦果。在當時「批

孔」、「反周」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我壓根未敢想過它能面世，得以發表，僅僅只是在一顆非常脆弱的學術良心的驅使下，想替孔子儒家找回它真實的歷史，以求從長期自欺而又欺人的精神困惑中解脫出來。不料「四人幫」剪除，否極泰來。適逢一九七八年中國大地開始撥亂反正，這篇習作才首次分上下兩篇，連載於我的母校出版的《陝西師大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二期上，得到孫叔平（南京大學教授）、王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與孫均已故）等前輩學者的好評與鼓勵，甚而被一些好心的朋友誤認作「老先生之手筆」。我也因此應邀出席了當年春季在濟南召開的「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會議」，我臥病因撰寫《考辨》而萌發的《中國儒學史》構想，還被列入了一全國「規劃」；儘管我至今自以為個人仍無足夠功力去完成它，但這無疑表明，《考辨》一文實際已成了我步入學術界的成名之作。今天看來，它雖像小孩子學走路，歪歪扭扭，尚未脫離康有為《新偽經學考》的羈絆，但它畢竟揭示出「儒的形成，表明中國社會已產生了第一代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進步」這個史實，還被爾後陸續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孔子大辭典》等辭書列為「一說」。我想，這大概便是學術界對我為堅持本學科的獨立研究而努力的一點肯定吧！

為了使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徹底走出近世以來一直被「借其枝葉之語，以圖遂其政治上之目的」的窠臼，獲得真正獨立自由的正常發展，八〇年代初，我終於連續發表了早在「文革」劫難中默默構思、習作的《論〈莊子·天下篇〉的思想史方法論意義》、《論荀學體系結構及其思想史觀》、《「關學」思想流變》諸篇文字。讀者一看便會瞭然，這是為了掙脫蘇聯日丹諾夫公式化、教條化的馬

列主義理論框架，尋找科學的哲學史、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而進行的初步探索。也是爲我同一時期發表而今列入本書下編的《論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問題》、《論中國哲學史的邏輯體系問題》諸文提供的佐證。均是爲了本門學科的獨立自主研究所作的辯證。所以，我取明季馮少墟（從吾）精心撰寫的《辨學錄》，以分儒佛二學之深意，將這部分文字統稱作「辨學篇」。其中《論朱子的「聖賢」人格理想》，是兩月前（六月一日）應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邀請，在臺北召開的「國際朱子學會」上宣讀的新作，因它與孔、莊、荀、張、李諸子可構成一系，故亦放置本編。

本書下編選錄的七篇文字，亦括爲前後兩個部分。前三篇，上承「辨學篇」關於莊、荀思想史觀及其方法論的歷史考察，順理接引當世理論現實，對五〇年代以來一直困擾著前賢師友，幾乎所有大陸哲學研究者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方法論原則」問題，進行了嚴肅的理論辨析。當然，促使這些文字一發而不可收拾的直接原因，主要還是自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的四五年間，中國哲學界連連舉行的太原「全國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會」（一九七九年）、黃山「正確評價歷史上唯心主義哲學討論會」（一九八〇年）、杭州「宋明理學討論會」（一九八一年）、桂林「中西哲學比較研究討論會」（一九八一年）、西安「全國中國哲學範疇討論會」（一九八三年），學人們的自由探討和認真切磋，對我哲學思維的啓動和導引。儘管難免蔽於一曲，個別觀點會有偏失，但這畢竟是我個人異於成說、自由思考的獨得之見。受到了師友們的高度評價，認爲「這些觀點，反映了當時哲學史方法論問題探討的新水平，有利於哲學史研究的進一步科學化」，肯定我「抱著探索新問題的理論勇氣，提

出不少新見解，為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撥亂反正、推陳出新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在師友們的鼓勵與督促下，自一九八三年以後，我同大多數嚴肅的學人一樣，開始深沉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形成了本書下編的後四篇文字。從這些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對中國走向現代化中的文化衝突和文化建設所作的哲學思考及其終極關懷。我認為，在當今中西文化衝突中，最迫切的還是要有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學術教養和氣度，積極調適中國文化價值系統，把昔日知識學人一貫標榜的「治國平天下」，真正落到「格致誠正」、「修身齊家」的實處，適應現代化的社會人生需要，重建一個新的獨立人格。此即本書下編之所以名曰「接引篇」，以示接引中西哲學文化的最終價值取向。

很顯然，這種「視學術為目的」，以學術之獨立、思想之自由為最高理想追求的中國知識分子，其實是充滿現實感，對現實極端關懷，最具有現代意識的「先知先覺」。獨立的純學術研究與現實的關懷，永遠是中國知識分子難以超越的理論情結。此乃本書所蘊涵之旨趣也。

本書編定一年後，有幸得到臺灣沈清松教授及商務印書館的朋友們的鼎力協助，今方得以付梓。特識於此，以示感念。是為序。

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 陳俊民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

同年九月二十三日改定於浙江大學求是村。

# 中國哲學研究論集

## 目錄

自序

上 辨學篇

孔子儒家考辨

——關於孔子儒家之儒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論《莊子·天下篇》的思想史方法論意義

三五

論荀學體系結構及其思想史觀

七九

「關學」思想流變

九五

論朱子的「聖賢」人格理想

一一五

李順其人其學與其書

——《二曲集》點校整理弁言

一三七

## 下 接引篇

論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問題

一五五

論中國哲學史的邏輯體系問題

一七五

中國傳統哲學邏輯範疇研究的歷史必然性

二〇三

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問題

二〇九

中國文化研究與文化反思平議

二二五

中國知識分子的功利意識

二三七

張載與康德的道德至善理想追求

——兼及中西哲學的發展前景

二四五

# 上 辨 學 篇



# 孔子儒家考辨

## ——關於孔子儒家之儒的形成及其歷史地位

儒，的確是我們中國特產的「名物」。孔子及其儒家，歷來是中國文化史和思想史、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它是與中國專政體制同生死、共始終的，弄清了它，真可懂得中國之大半。歷代思想家、經學家有關「儒教」、「論儒」、「說儒」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棟，難以勝舉。自一九四九以來，史學界、哲學界的學者們對孔子和儒家思想開展了各種學術討論和研究活動，而且已取得了顯著成果。這是無可抹掉的歷史事實。可是，孔子儒家的本來面目究竟如何？孔子儒家之儒到底怎樣形成？還不完全清楚。尤其是當學術思想界經歷了「四人幫」構難的「批儒」運動那樣急風暴雨般地洗劫之後，儒家幾乎變成了歷史的罪惡，學術研究的禁地。它在歷史上的本相、地位和作用，更令人無從認識。本篇是想比較詳細地考察一下儒的產生，探尋儒家的源頭，肯定孔子儒家之儒的形成是中國

社會的一大進步。

## 儒不是西周時代中國特產的「名物」

對「儒」這一「名物」，做一點正本溯源的工作，乃是正確評價孔子儒家的歷史地位及其作用的前提。

至今不少論者都認為：儒家之儒來源於周代「有六藝以教民者」的「儒」，它「早已存在，不自孔子始」（金景芳：《論儒法》，見一九七七年《歷史研究》第五期）。我以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奴隸制的鼎盛時代，中國不可能產生「儒」。

### 甲、周代始有儒的說法從何而來

孔子以前無儒名。「儒」字在孔子以前的文獻裏竟一無所見，被公認為創立儒家學派的孔子，除了告誡子夏時說過「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論語·雍也》）之外，他從來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個「儒」。就是他的再傳、三傳弟子子思、孟軻，也只申張師道，發揮其微言大義，很少言「儒」。墨

子算是最早給孔子及其門徒冠上儒名的人，但他只是批評了儒者「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繁飾禮樂」、「循而不作」等等不合時宜的思想和主張（《墨子·非儒下》），並沒有透露儒出於周代的消息。只有戰國末年的荀子，才始以儒自詡，他的書中「大儒」、「雅儒」、「俗儒」、「賤儒」、「偷儒」的名字俯拾皆是（《荀子·儒效》、「非十二子」、「修身」等篇）。但他專論了「禮起於何也」的問題（《荀子·禮論》），卻沒有追溯儒的淵源。他的學生韓非，是先秦法家的有名人物，專與儒者作對，承認孔子儒家之儒是「世之顯學」，指斥儒「以文亂法」，「稱先王之道」，「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是「亂國之信」（《韓非子·顯學》）「五蠹」篇），但也沒有追查出儒的祖宗是「周公」。被稱為孔子老師的老子以及道家莊子，除講過幾句「絕仁棄義」、「禮者忠義之薄」之類對儒不大恭敬的話語（《老子》十九章、三十八章），同儒者開過一點像「儒以詩禮發冢」（《莊子·外物篇》）那樣的玩笑之外，他們對儒還是比較尊重的，稱它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的「君子」（《莊子·天下篇》），但也同樣沒有給這一「君子」撰寫出從何而來的歷史。

總而言之，孔子以前無儒名。孔子死後，百家爭鳴，墨道名法各派人物對孔子儘管有時以儒相稱，或譏或譽，但學風純樸，常常是直呼其名，舉出人物來作論說對象，從來沒有將孔門子弟隱括為「儒家」，更無人認真探究孔子儒家之儒出於何時，源於何處。

過去論者們認為，儒家之儒來源於周代「有六藝以教民者」之「儒」。這一說法最早出自於漢

代，是漢儒經師們有意偽造而混入史籍的。有趣的是做這一竄亂工作的，開始並不是對孔夫子多麼尊重的儒門子弟，而是身居朝廷「掌天官，不治民」（《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集解序》），很有一些黃老氣味的封建史學家。這不是從漢代儒家經學之內，而是從它之外那被譽為「（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的「良史」們那裏產生的。這一說法，便自然成了鐵案難移的信史，向來使讀者「臺臺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後漢書·班彪班固列傳論》）。

「青青陵麥蔽荒村，溺盡儒冠問叔孫」（章太炎：《儒冠》）。漢初，孔子儒者雖然受了點委屈，劉邦動不動就要給儒者頭上灑尿。「文景之治」期間，黃老學說又風靡一時，儒者很是不走運，上書言治，曾幾次遭到丟官殺頭的危險<sup>①</sup>。可是到了武帝登臺後，竟出現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新時期。司馬遷真實地記錄了這一關係以後幾千年儒者命運的巨大轉機的盛況：

「及今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以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特別是公孫弘為「學官」以後，武帝批准了他提出的：建立官學、廣置博士，「勸學修禮」、

「以廣賢材」的建議。自此，從朝廷到郡縣鄉里，政府的各級官吏都是以儒者為「備員」，「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序》）。

就是在這種儒者從社會下層走向朝廷作官，紅運亨通的背景下，周代始有儒的說法應運而生，而且被歷代學者愈演愈真，簡直成了無可非議的歷史定論。

請看此論的演繹過程：

在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公元前一四〇—公元前一一〇）年間，任太史令的司馬談，首開為先秦諸子建立家派的先例。他專著《論六家之要旨》一文，把先秦諸子百家歸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第一次提出了「儒家」的概念。儘管他曾「習道論於黃子」（《史記》徐廣「集解」云：黃子就是「好黃老之術」的黃生），對儒者並不大喜歡，但他仍然比較客觀地指出了儒家之得失。他說：「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表面看起來，司馬談在這裏只是評判了儒家的特點及其對封建社會的作用，並沒有鉤稽出它的先祖。但是，他給儒者所作的這個「以《六藝》為法」的定義，事實上，成了西漢末劉向父子，特別是東漢的史官班固，推演出周代始有儒這一說法的「橋樑」。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他確實是個比較忠實於史實的偉大史學家。他繼承了父親未竟之志，給孔子寫了「世家」，為「仲尼弟子」以及秦漢之際的儒者都立了「列傳」。雖然，他敘述了孔